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产业与家庭经营*

——以 S 市域调研为例

付 伟

提 要：长期以来，我国乡村产业对于吸纳乡村人口就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家庭经营是乡村产业的微观经营基础，在家庭“半工半耕”的基础上，乡村产业依托既有城镇节点、历史传统、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社会关系，形成了一个多元、分散、灵活的就业体系。新时期乡村产业的新发展，繁荣了乡村业态，也进一步丰富了家庭“半工半耕”的内涵。家庭在兼营农业的同时，在本地非农就业与外出务工之间灵活选择，形成了一个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外出一回流”机制。乡村产业也进一步改变了城乡格局，为“就地城镇化”提供了基础。本文进一步指出了乡村产业与本地城镇化之间的复杂机制，尤其是在家庭决策基础之上形成的“代际流动”的城镇化。

关键词：乡村产业 城镇化 家庭经营 就地城镇化

一、导 言

中国城镇化进程有着特殊的路径，尤其是产业与城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业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却没有出现与之同步的城市化，而是呈现出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低度城市化”现象（Szelényi, 1981；Ofer, 1976）。这与中国实行的“赶超战略”有着紧密的关系，为了降低工业化成本建立了旨在限制人口流动的“城乡二元制度”（林毅夫等，1999：77—78）。改革开放以

* 本文得益于周飞舟教授主持的“S市域总体规划社会学调研”，傅春晖、凌鹏、焦长权、王绍琛、吴柳财、秦鹏飞、左雯敏等参与了调研与讨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区域规划研究所，以及调研所涉及的县市、乡镇和村委会的相关人员对此次调研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后,我国逐步放松了对农民进入城市务工的限制,与此同时,工业化迅速发展并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的城市化仍然维持在一个低度城市化的水平(Chang & Brada, 2006; Zhang & Zhao, 2003)。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特殊的工业化模式有关,虽然“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并没有脱离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 2002)。

在既有的城乡二元理论框架下看待城镇化,忽视了乡村社会的内生型发展逻辑(鹤见和子, 1989)。在城市现代工业吸纳人口有限的情况下,长期以来中国乡村对于涵养过剩人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形成了独特的乡村转型路径。近代以后,乡村社会发展了一个复杂多元的产业体系,“包括了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自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吴承明, 2001: 52)。改革开放以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可以看作乡村产业的历史延续与发展。近年来,中西部乡村产业取得了新发展,为“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提供了条件(李强等, 2015)。虽然存在着大量因人口外流而出现的空心村、空壳村,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仍然有大量因为特色产业而繁荣的村庄。这个复杂、多元而又自成一体的产业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如何认识和评价乡村产业,是认识我国城乡转型的关键。我国乡村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乡村产业便是植根于乡土社会的“经济生态系统”(徐宗阳、焦长权, 2016)。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之上,乡村产业依托乡村的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以及既有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与既有的集市、乡镇和县城这些城镇化节点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

本文基于实地调研的材料,讨论乡村产业的发展与城乡格局的变化。2017年,笔者所在团队对S市下辖的JZ市、XL市、XT县、Z县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研,收集了大量关于产业发展、人口迁移与流动意愿的资料。

二、乡村产业与家庭经营

近代以后,我国农村面临着严重的人地矛盾,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问题。但是城市工商业发展有限,吸纳不了庞大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吴知, 2009: 321; 黄宗智, 2000: 124—141; 费孝通, 2012: 16)。在“过密化”和

商品化的双重影响下，乡村兴起了发达的非农就业部门，形成了一个多元复杂的产业体系（林刚，2000）。由于发达的乡村产业，乡村社会的结构和社会秩序也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保持了相对完整。费孝通对传统时期乡村工副业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等的一系列经典作品揭示了乡村非农就业对乡村社会的重要意义。

乡村产业的微观经营机制是家庭经营。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小农形态”，这种所谓的“传统小农形态”融合了自然经济与有限的商品经济（许倬云，2012；林刚，1995）。在经典理论看来，工业化和商品化会导致小农经济解体，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业规模经营和城市人口增加。但是，近代以后农村的“商品化”，反而固化了小农经济，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工结合”（赵冈，1977：227；费孝通，2007：158—163）。农村中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并和农业生产紧密配合成为农户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史建云，1994；黄宗智，2000：124—141）。进一步，也有研究指出农村商品化反而分散了地权（凌鹏，2007）。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包产到户和家庭经营体制的确定，以及政策上对乡村和基层的放活，乡镇企业在广大乡村地区“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据统计，1983年到1989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劳动力达6300万人（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2）。乡镇企业有着复杂的样态，费孝通总结有十几种“模式”（费孝通，2009：186—187）。在乡镇企业的带动下，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但是中西部地区受制于地理、资本、市场等条件的限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乡镇企业迅速衰落，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继续“淤积”在乡村。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沿海地区快速工业化和“世界工厂”的形成，中西部农村过剩劳动力开始普遍外出打工，中西部劳动力到东部地区、大中城市打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导模式。20世纪8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就开始大量吸纳农民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1989年就已经达到了3000万人；进入2000年以后，农民工外流的规模急速扩大，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工厂”，东部沿海地区在短期内吸纳了更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到2004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口达到了1.2亿（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4）。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流有着特殊的逻辑，表现为在城乡之间“钟摆式”运动和“兼业

式”季节性外出务工（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6）。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殊的城镇化模式——“半城市化”，即大量转移劳动力无法到城镇落地，一直处于流动的模式，从而处于一个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王春光，2006）。“半城市化”的劳动力流动模式导致了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并没有完全脱离乡村社会，而是打工家庭在空间上的分离。

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异地”打工的背景下，乡村依然延续了“农工相辅”的家庭经营模式。一方面，家庭普遍占有并经营土地，但在另一方面非农收入尤其是外出打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情形被贺雪峰总结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并且指出，当前大约有80%的农民家庭都是“年轻子女外出务工以获务工收入、年龄比较大的父母留守在家务农以获取务农收入”（贺雪峰，2013）。中西部地区农村，一部分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或兼业，一部分农民在家务农，形成“半工半耕”的职业格局和收入结构（杨华，2015；夏柱智，2014）。

值得注意的是，在“异地务工”的背景下，乡村虽然普遍遭受了人口外流的冲击，但是依然有活跃的乡村产业。对于中西部家庭来说，虽然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在外面打工挣钱，但是部分家庭成员（父母、子女）依然留守在农村，依然在农村保有耕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依然保持了亲友熟人关系网络。由于家庭这个纽带，外出打工并非一个单向迁移，实际上外出劳动力总是在农村与打工地之间“往返流动”。近年来“返乡创业”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家庭因素正是促使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动力（陈文超等，2014；谢勇、周润希，2017；祝仲坤，2017）。人口的“往返流动”有着鲜明的年龄和代际特征，结婚前以远程单向流动为主、以服务业为主要就业行业；结婚生子后以往返流动为主、以制造业为主要就业行业；孩子长大后以频繁返乡流动为主、以建筑业为主要就业行业（王绍琛、周飞舟，2016）。不断“返乡”的劳动力，以及随之带回的资金和技术，使得乡村产业依然保持了活力。

由于不同历史、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中西部乡村地区也产生了分化，在一部分村庄“空心化”的同时，也有相当多的村庄依托于历史传统与特色资源，发展了丰富多元的非农就业体系，成为“就地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也为乡村业态的繁荣提供了条件。首先，乡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汽车保留率大幅度提升，扩大了劳动力的活动半径，使得“回流”更加普遍。其次，互联网和物流体系进入乡村，为乡村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机会。再次，随着打工收入增加和农村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的改变，乡村兴起了更多的商贸服务需求。

乡村非农产业的兴起与繁荣，与农业经营进一步密切配合，形成了一个复杂多元的乡村经济生态系统。这个经济生态系统丰富了乡村业态，也使得“半工半耕”的家庭经营呈现新的内容。一方面，由于乡村产业的存在，劳动力可以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灵活地在本地与外地之间“往返”。同时，乡村产业的发展导致了“半工半耕”模式进一步演化，出现了本地农业与本地非农就业的结合，形成了本文所谓的“双顾模式”，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特殊的城乡融合道路。

2017年7月，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对S市下辖的四个县市进行了实地调研，涉及9个乡镇18个村。本次调研分别在乡镇、村以及村民小组等不同层级展开了访谈。在乡镇政府，我们访谈了分管城建、工业和农业的乡镇领导。在每个村，我们对村支书或村主任进行了访谈。每个村还选取了三个至四个村民小组长进行访谈。此处对小组长访谈要做说明的是：村民小组是村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共同体，小组长对共同体成员的基本情况十分了解，通过对村民小组长的详细访谈，我们能够了解全组农户的农业经营、非农就业、买房以及迁移情况。调研村庄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调研村庄基本情况

		农业（粮食/特色产业）	非农业（本地/外出）
JZ市 ZSZ镇	XZK村	一半粮食，一半果树	本地务工（乡村工业、XJ市皮革加工）
	ZSZ村	粮食为主，少量梨树	本地务工（乡村工业、商贸服务）+少量外出务工
JZ市 MY镇	XD村	果树	本地务工（乡村工业，70多家企业）
	MFY村	果树为主	本地务工（乡村工业）
XL市 HT镇	XL村	大棚甜瓜	本地零工为主
	JG村	粮食	外出务工+本地零工
Z县 XZD镇	XZD村	粮食+养殖业	本地务工（园区）
Z县 FZ镇	FZ村	梨树	本地零工为主
	NZ村	梨树	本地零工为主
XL市 ZM镇	LX村	粮食	外出务工为主（石雕行业）
	CG村	粮食+养殖	外出务工为主（石雕行业）
XL市 PJZ乡	XZP村	粮食	本地务工为主（假发产业）
XT县 SB镇	XJ村	粮食	外出务工为主（建筑、家政，北京、天津、S市）
	LCG村	粮食	外出务工为主
	DBJ村	粮食	外出务工为主
XT县 KT镇	KT村	粮食	外出务工为主
	LJZ村	粮食	外出务工为主
	BGD村	草莓	外出务工+本地零工

三、乡村产业的延续与变革

进入2000年以后，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成为乡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乡村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导模式。但是中西部乡村地区依然存在着复杂多样的产业形态，形成了一个根植于乡村社会的经济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包括农业和非农就业——尤其是应该看到，乡村社会有着灵活、多元和分散的非农就业体系。下面分别从农业、非农产业的经营情况介绍这个经济生态体系的特征。

在农村农户普遍承包、经营耕地的情况下，农业依然是农村的重要产业，但是农业经营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S市周边地区的农业经营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粮食种植和经济作物种植。但不论是粮食种植还是经济作物种植，都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不占主导地位。虽然存在着少量的土地流转，也基本上是亲戚朋友之间的流转，或者是从村集体承包集体果园。在调研的村庄，即使有零星的土地流转，流转费用也十分低。

首先来看粮食种植。S地区的粮食作物主要是轮作玉米和小麦。本次调研的ZSZ村、LX村就是典型的粮食种植村。由于劳动力的外流，农村面临着季节性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小块土地经营也面临着难以实现机械化的问题。但是实地调研发现，S市周边地区却并没有出现粮食的规模经营，依然以家庭自耕为主。这主要是由于S地区粮食作物的种植模式发生了变化，建立在小农经营基础上的社会化、机械化服务体系极大地节约了劳动力。从而使得在人口外流的情况下，即使不流转土地、不规模经营也可以解决种地的问题。由于主要种植环节的机械化、雇用化，粮食种植只剩下打药、施肥等十分简单的田间管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可完成。由此，粮食种植变成了一个“老人农业”、“简单农业”。“现在没人自己种，都是六十以上的种，五十以下的都在做活（打工）不种地，年轻的没人种地，老人种地不费工”。而以集市为依托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挥了极大作用（韩启民，2015）。

其次，在粮食种植变革的同时，S地区许多村庄兴起了经济作物种植。经济作物、养殖业取代传统粮食作物以及经营规模增加被黄宗智称为“隐性农业革命”（黄宗智，2016）。S市的特色农产品主要是水果，尤其是梨树、葡萄、苹果和甜瓜。经济作物种植最为典型的村庄有：XD村（梨）、MFY村（葡萄、梨）、XL村（甜瓜）。与粮食种植相比，水果种植需要较高的劳动力投入和较高的资本投入，即所

谓的“劳动和资本双密集”（黄宗智，2016）。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经济作物种植也是以家庭经营为主，而非“规模经营”。下面以梨树种植为例说明经济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劳动力使用和资本投入，以及为何以家庭经营为主。

梨树种植比粮食种植需要更大的劳动力投入，并且许多环节依赖劳动力雇用。首先冬季需要剪枝，剪枝冬季一直可以干，不需要雇用。打药大概6次，分别在三月开春、五月十日套袋以后、五月底六月初、六月下旬、七月中旬；打药一般自有劳动力完成，农药成本五十元至七十元一亩。上肥4次，分别在三月开春、六月膨果期、七月份以及九月份，上肥一般也是自有劳动力完成，一天一个劳动力可以完成3亩。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环节是疏果、套袋和采摘，也是雇用最多的环节。疏果在四月份完成，一般一个劳动力每天能够完成五六棵树，每亩大约42棵树。也就是说，疏果每亩大概需要7个工，疏果的雇用成本是八十元至一百元每天。套袋从五月七日至十日开始，必须在六月之前套完（MFY村），一说五月二十三日之前必须套完（XD村）。总之，套袋有着较为紧迫的时间限制，大概在20天内必须完成，因而成为梨树种植最为主要的雇用环节。一个人一天最多能套一千个袋，一亩地大概需要套袋一万三四千个。雇人套袋的工钱是一个袋给7分钱。采摘，一直从七月十五日延续到九月十日左右，大概5天摘一次，包括采摘、包装、入库等环节。摘梨的劳动效率，一天一个人能够摘五六十箱。摘梨一般靠自家劳动力完成，这时候家里的孩子也会帮忙。有的家庭劳动力不足也会雇人。装箱亦是如此，实在忙不过来需要雇人，雇用费用是一天100元或者采取计件制，每箱1.2元至1.3元。梨树种植还有其他成本，包括农药、化肥、水电费，根据实地调研对每亩梨树种植的成本估算如下（见表2）。

表2 每亩梨树种植的成本估算

项目	农药	肥料	浇水电费	疏果①	套袋②	采摘、装箱、入库	亩均总收入③
成本（元）	350	1400~1500	160	700	1000	8个工，约800	5000

① 按照每亩42棵树，每个工疏果五六棵计算。雇用成本根据访谈情况估计，不同地区、梨树的不同品种有差异。疏果、套袋、采摘三个环节按照全雇用计算。

② 按照每亩10000个梨，套袋每个7分计算。袋子成本每个四五分钱。

③ 梨的产量，皇冠梨每亩可以达到上万斤、鸭梨大概亩产八九千斤（XZK村）。价格跟梨的品质有关，在所有梨果中优品一般只有三分之一，残次品多。优品才能卖到每斤1.3-1.4元，残次品卖得低大概只能卖每斤0.8元，剩下三分之一只能扔。大概每亩梨一年能卖5000元（XZK村），在XD村也说“四五千”。

每亩梨的毛收入大概 5000 元，而每亩梨树的投入是 3600 元至 3700 元，其中固定投资比如农药、化肥不到 2000 元。每亩 3600 元至 3700 元的投入是按照最高标准计算，即假定疏果、套袋、采摘环节都全部雇用。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农户的经营策略是尽可能的减少雇用，尽可能地使用自家劳动力，以期获得最大的收益。因此我们看到在果树种植过程中很少出现规模经营。第一，规模经营意味着所有工作都靠雇工，成本高就挣不到钱了。第二，大规模承包需要大量资金，并且也意味着风险增高。第三，如果大量的环节雇用，也很难对劳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由此，梨树种植的重要特征是家庭经营，利用家庭自身劳动力，尽量减少雇用，根据自家的劳动力决定梨树种植的规模。“40 多岁两口为主，20 多岁年轻两口在农忙时候帮忙。在不雇人或者少量雇用的情况下，最多能种三五亩地。”在调研中，甚至经常发现许多农户兼营粮食和果树的情况。由于自家劳动力有限，农户以自身的劳动力为基础种植梨树，剩余的土地种植不费劳动力的粮食。当然农户承包的耕地分块而细碎也是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

S 地区农业经营只是乡村经济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应该看到 S 地区还有发达的非农产业，带动了一个“灵活、分散、多元”的就业体系，并与农业经营紧密配合，也使得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形。学术界既有关于“半工半耕”的讨论都是描述“粮食种植 + 外出务工”，典型的是 Z 县 ZM 镇、XT 县大部分村庄。粮食种植模式的变革极大降低了耕作的劳动力投入，使得劳动力可以长期的转移到非农就业领域，在空间上则表现为跨区域流动。S 地区还存在着“经济作物 + 本地务工”模式，是本地非农就业和本地经济作物相结合的“半工半耕”，比如 XD 村、MFY 村等。这几个村庄，一方面有发达的非农就业机会，一方面又发展了特色农业（见表 3）。

表 3 S 市乡村地区农业与非农就业结合模式

	农业	
打工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水果）
本地务工	XZP 村，粮食 + 假发	MFY 村，梨树 + XJ 市打工（服装） XD 村，梨树 + 本村打工（村庄工业） XL 村，甜瓜 + 农业产业 ZSZ 村，梨树 + 工商业
外地打工	Z 县 ZM 镇、XT 县大部分村庄	几乎没有

乡村产业体系中的农业与非农就业紧密配合，并且乡村非农就业对于本地特色农业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农村农户普遍兼业化的情况下，有学者担心农民兼业化会对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不利影响（李庆等，2013）。农民的兼业行为会降低农业生产的人力投入，农民家庭会通过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胡浩、王图展，2003）。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恰恰是本地非农业促进了特色农业的发展。一方面，特色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并且需要家庭中最有经验的劳动力参与，与之相应的，几乎没有特色农业配合外地长期务工的村庄。但是另一方面，家庭经营特色农业的收入有限，加上农业经营的季节性特征，又必须与非农就业机会相配合。S地区主要农作物的毛收入（见表4）。

表4 S市乡村地区主要农作物毛收入情况

	亩均毛收入	普遍的经营规模	农作物	亩均毛收入	普遍的经营规模
梨树	5000元	3—5亩	甜瓜	12000元	4—5亩
葡萄	7000元	不定	小麦、玉米	1000元	不定
李子	4000元	不定			

一亩梨树的毛收入5000元左右，大部分的经营户种植3—5亩，除去成本以后，每年的净利润在10000元到15000元，必须与本地的非农就业相互配合，对于一个家庭才划算。因而只有具有乡村非农产业的乡村，才能发展农业产业化。

此处需要对XL村和XZP村做一个说明。XL村的甜瓜种植比较例外，XL村的大棚甜瓜种植一般采取“上季瓜、下季菜”的种植模式，几乎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田间劳作，一亩大棚在常规年份的纯收入是12000元左右。大部分家庭都经营四五亩地，所以一户的平均年纯收入能达到四五万元。因而完全实现了依靠农业产业带动乡村就业，选择外出打工或者从事其他副业的劳动力只有少数。再来看XZP村，由于该村假发行业比较发达，几乎全村都投入到了假发产业，因而也没有发展出来经济作物。

综上，乡村产业作为一个经济生态系统，我们总结有如下特征：

第一，农业和非农就业紧密结合。一方面，在人口外流的情况下，“打工+种地”依然是村庄的普遍经营模式。但是在一些资源和地理条件有优势的地区，发展起来了丰富多元的乡村产业体系，乡村工副业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动力，也在一定程度带动了特色农业发展。非农化带动乡村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并非通过“人口离乡”、“土地流转集中”的方式实现。从实地调研的经验来看，乡村非农化与乡村

特色农业的发展并行不悖。

第二，家庭经营。家庭是重要的经营基础，也是理解乡村产业体系的重要视角。乡村产业形成一个农工配合的体系，这个体系运行的关键是“半工半耕”的家庭经营模式的延续与创新。由于乡村产业有着极为复杂的业态，家庭经营也呈现不同形式：“粮食+外地打工”、“农业产业+本地打工”、“本地农业产业化”和“粮食种植+本地非农就业”。

第三，乡村产业更是一个城乡融合的体系。其一，城镇节点在乡村产业兴起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反过来乡村产业又激发了其发展。其二，随着乡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出现了一种“通勤打工”的本地非农就业模式，这种非农就业模式与“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就业模式有着一定相似性，固化了既有的村庄社会结构，当然也使得其产生了巨大的转变。

四、乡村非农就业

乡村非农就业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农业产业化、乡村商贸服务业、乡村工业。乡村非农就业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生态系统（见表5）。

（一）农业产业化

粮食种植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雇用市场创造了许多乡村就业机会。而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更是提供了大量的农业雇用机会。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一般以家庭自有劳动力辅以季节性的雇工经营完成。农忙季节的农业雇工，已经成为乡村劳动力打零工的重要途径。

进一步，围绕着特色农产品形成了种植养殖、收购、加工、贸易的多个环节，成为乡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典型的是Z县的梨产业链条，围绕梨果生产形成的一系列轻工企业。以Z县FZ镇为例，FZ镇共有企业39家，果品加工厂1家，包装制品企业36家，占到FZ镇所有企业数量的92.3%，产值最高的5家企业均为梨果相关企业。另有用于存放梨果的冷库197家。梨树种植进一步带动了旅游业，Z县梨花节自2000年开始，至今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举办模式。梨花节的持续时间从每年的4月5日到4月20日，对周边市镇的居民有一定的吸引力。

表 5 S 市乡村非农就业的典型形式

		典型村庄	具体内容	就业形式	劳动力居住地点	收入水平
工业	乡村工业	ZSZ 村	本村工厂, 吸纳 250 人	灵活就业	本村	不同工厂不同
		XD 村	具体情况见下文, 吸纳了村庄绝大部分劳动力	季节性, 灵活就业	本村	月均三四千元
		MFY 村	乡村制衣作坊, 100 女工	季节性, 灵活就业	本村	年收入两万元
		XZK 村	3 个作坊, 30 人	季节性	本村	不详
		XZK 村、MFY 村	XJ 市皮革加工, 女工	季节性, 夏季歇业	离 XJ 市骑电动车 20 分钟, 旺季住宿舍	年收入三万元
		XZP 村	假发产业, 1000 人 (从家庭副业发展起来)	详见后文	详见后文	不同环节收入不同
	园区工业	XZP 村	假发行业龙头企业, 300 人	工厂制	本村	不详
		MFY 村	乡村工业, 40 人	工厂制	本村	男工, 年收入三四万元
农业产业化	XD 村	梨果相关企业	季节性, 灵活就业	本村	不同企业不同	
	FZ 镇	果品加工厂 1 家、包装制品厂 36 家、冷库 197 家。	季节性, 灵活性	本村	不同企业不同	
	XL 村	甜瓜种植	季节性	本村	户均年收入 4 万—5 万元	
商贸服务	运输	XZP 村	80—100 人, 依托于工业园区与本地农业产业	灵活就业, 自营	本村	不详
	商贸	ZSZ 村	商业, 800 个商铺	自营/出租	本村	不详

(二) 乡村商贸服务业

乡村社会既有的集镇体系为乡村提供生活、生产和其他公共服务, 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施坚雅, 1998; 费孝通, 2009: 192)。乡村集市体系发展起来的商贸服务业也是乡村产业的一种重要业态, 为乡村灵活就业提供了平台。

以 ZSZ 镇为例, ZSZ 镇位于“五县连庄”的交通枢纽, 历史上就是覆盖远近乡村的大集市, 商贸物流业十分发达。镇区有 800 多家商户, 下辖的 21 个村平均每个村有商户 50 户左右, 全镇总计将近有 2000 家商户。此外由于当地的果树种植, 尚有果品站 100—120 个, 果品站一般由当地人经营, 充当外地人在本地收购水果的经纪人。

（三）乡村工业

乡村社会的工业就业主要有两种途径：乡村工业与园区工业。但是从实地调研来看，园区工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很少，主要是由于园区工业一般都是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的工人不多。从 S 市周边地区的工业园区就业情况来看，XZP 村大概有 300 人在园区就业，MFY 村大概有 40 人。

带动就业比较多的恰恰是分散在乡村社会中的各种乡村工业，这些工业规模小，与乡村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乡村工业有着十分多元复杂的特征，下面以 ZSZ 镇的工业为例介绍乡村工业的主要类型。

第一类，与农业相关的产业，包括果脯厂、食品厂、冷库、纸箱厂以及从农业（水果种植）衍生出来的托盘厂、工业纸箱。这类企业一般都是季节性用工，并且收入较低。ZSZ 镇的纸箱厂有两三家，只在收获季开工生产，每个厂雇用几个人。冷库 118 家，每个冷库雇工量少，平时只有两三个人看管，每年 8 月份入库期间用工最多，主要是临时雇用的搬运工。

第二类，纺织业，包括纱厂、布厂、浆纱厂。纺织业一直是华北平原重要的工业类型，可以追溯很长的发展历史（周飞舟，2006；吴知，2009）。ZSZ 镇有纺织二十多家，包括织布 15 家和十几家纺纱。这些企业规模较小，经营比较灵活，根据行情随时停产或开工。这二十多家企业全部开工的时候可以雇用 200 个工人。工资一般在 3000 元左右，若旺季加班，每天工作 9 - 10 个小时，能挣到六七千元。ZSZ 镇尚有无纺布企业 5 家，生产的布主要用来做口罩，也有档次比较低的布用作水果套。大布厂用工十五六个，小的也就两三个工人；加起来雇工三十来个人。

第三类，建材、五金。这类乡村工业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集体工业时期。ZSZ 镇有车床加工企业十几家，规模都不大，最大的一家二三十台车床，每台车床一个工人。值得提到的是，锅炉业在 ZSZ 镇是比较红火的产业，有春尔、攀龙、成龙三家较大的企业，春尔锅炉曾经是省第二大锅炉企业。锅炉行业需要大量的电焊工，一般采取外发加工的形式。锅炉行业总共用工 200 来人，电焊工工资六七千元。

第四类，从家庭副业发展起来的产业。ZSZ 镇没有典型的家庭副业，此处以 XL 市 PJZ 乡 XZP 村的假发产业为例说明。XZP 村基本上全村的人都从事着与毛发相关的工作。三十年前，村里有人开始去全国各地收头发，后来带动了整个村收头发、做假发，慢慢形成了有关毛发的一整套产业链。这一产业链条非常完整，从收头发（150 户，一般夫妻一起从事）——拣发（利用家庭剩余劳动力）——整档（50 个

家庭作坊)——做发链、假发(长发)(2个工厂)——生产氨基酸(发渣)(1个工厂、尚有1个没投产),每一个环节村里都可以完成,无论劳动力还是设备都在本地。

第五类,新型产业。汽车配件是ZSZ镇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包括脚垫、尼龙胶管、汽车顶棚、汽车内饰等。最大的汽车配件企业是安达汽配,主要生产汽车脚垫、尼龙管、顶篷,是JZ市的纳税大户。该厂雇工200-300人,女工较多,主要生产尼龙油管和汽车顶棚,接吉利、上海一汽等大厂的订单。ZSZ镇有三十多家汽车脚垫厂,规模较小,雇工从三人到几十人不等,有些通过网店销售,有些接汽车厂订单,整个行业雇工大约三百多人,主要分布在ZSZ村、YC村、DDYT村。

以上是ZSZ镇乡村工业的主要类型,这些可以“识别”的乡村工业大概总计使用了2000名工人。但是除了这些“可以识别”的非农就业,还有大量更为分散、隐蔽的就业机会。比如MY镇的制帽产业,通过46家外发加工的网络动员了全镇的妇女老人等闲散劳动力,总计带动了约3000人。

乡村非农就业体系是植根于乡村社会的体系,而且这套体系也必须依托乡村社会才能存在。由于农业产业、乡村商贸服务业本身就是乡村社会的一部分,此处重点论述乡村工业的特点。与城市工业不同,乡村产业的重要特征是:与家庭生活紧密结合;与农业生产紧密配合。乡村工业一般有以下特征:

第一,乡村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华北平原传统时期就是乡村手工业十分发达的地区(方显廷,2009;吴知,2009)。新中国成立以后又继续延续与发展。以XD村为例,20世纪70年代XD村开始发展集体副业,主要产品是肥皂、尼龙绳、尼龙网,当时7个小队,每个小队大概20人就业。1974年开始兴办大队副业,主要的行业也是肥皂、皮革、皮鞋、手套(外贸出口),以及一个砖窑,共计用工50-60人。1970年代,全生产队将近400个劳动力从事工副业。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队先后兴办了面粉厂、肥皂厂、陶瓷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村办企业都纷纷转制或者停办。1983年,XD村开始兴办个体私营工业,刚开始主要是做蜡烛、花炮。现任村支书是发展私营工业的先驱,刚刚包产到户的时候,他通过关系买到一车皮做蜡烛的原料,然后外发给农户加工。20世纪90年代以后,私营工业大量兴起,发展到今天的70多家企业,吸纳了全村95%的劳动力。

第二,乡村工业生产形式复杂多样。除了极少数正规的工厂以外,主要都是各类小型、分散的生产主体。有家庭内劳动,比如各种家里的手工业、农特产品加工、

假发拣选等；有乡村小作坊，比如乡村开办的各种食品加工、服装加工厂。许多乡村工业甚至 ZSZ 镇的锅炉生产都采取外发加工的模式。在历史上，这种分散的加工形式被称为“包买制”，今天依然是乡村产业的重要生产形式（方显廷，2009；傅春晖，2014；周飞舟，2006；付伟，2016）。这种分散的生产形式，节约了生产成本，也使得工人的生产与家庭生活紧密结合。

第三，用工形式灵活，普遍的非正式雇用（黄宗智，2009；黄家亮，2017）。许多乡村产业都是季节性用工。一方面由于产品本身的销售周期；另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农业的生产周期，农忙停工、农闲开工。更重要的是，乡村产业与家庭生活能够紧密结合。从收入水平上看，乡村产业与外出务工相比并不占优势。许多劳动力之所以选择在本地就业，主要是能够同时兼顾家庭生活。因此，乡村产业的工作时间和劳动管理显得十分宽松。

第四，乡村工业“淤积”在乡村，这与乡村工业的土地来源有关。乡村工业一般使用农村存量建设用地，甚至还有部分企业租用农户的宅基地，极大地节约了经营成本。这些建设用地大部分都是早期的乡镇企业用地，比如 ZSZ 镇线缆厂租用的厂房和土地就是源于早年的乡办企业。XD 村之所以能够发展 70 多家乡村工业，也正是因为该村有大量的存量建设用地能够建厂房出租。

五、乡村产业与城乡融合

（一）乡村产业与村庄变迁

由于乡村产业的发展，使得所谓的“半城市化”呈现出新特征，形成了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回流”模式（王绍琛、周飞舟，2016）。乡村产业与外地务工处于一个城乡融合体系中，两者对于处于不同生命历程的劳动力来说有不同的意义。通过劳动力的“往返流动”，实现了城乡的融合。在此基础之上，也形成了“外出打工、返乡买房”的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进一步，随着乡村产业的发展，一些村庄迅速改变了乡村面貌，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具体来看，有以下几种模式。

第一，农业产业化带动型。我国许多乡村地区都有特色的农业产业，比如南方的茶叶，包括茶叶采摘、收购、运输、加工以及销售的各个环节与城镇化的关系

(徐宗阳、焦长权, 2016)。S 地区比较典型的是 XL 市 HT 镇 XL 村, 全村总人口 2300 人几乎全部从事甜瓜种植, 大棚面积达到了 2500 亩, 通过农业产业化实现了乡村社会转型与城乡融合。

第二, 工业带动型。当地有 XD 村和 XZP 村, 但是这两个村也有差别。XD 村是本地工业与经济作物种植相配合, 而 XZP 村则是粮食种植与本地工副业配合。这与两个村乡村工业的发展程度不同有关。XZP 村假发产业的带动能力更强, 而且覆盖面很广。除了通过园区企业、运输业吸纳青壮年就业, 还通过假发的收购、分拣环节, 使得乡村许多闲散劳动力都能够进入乡村工副业。

第三, 商贸带动型。JZ 市 ZSZ 镇 ZSZ 村, 依托其三县交界的地理位置, 商贸服务业发达。镇区和分散在村中的商铺, 加上为果品提供收购、运输服务的从业人员, 估计全镇从事乡村商贸服务业的人口达到了两三千人。此外, 还有大量人员外出销售本地工厂的产品, 比如线缆、锅炉等。

由此, 我们看到村庄的产业发展有着不同的带动模式, 但是无论哪种形式都依然与乡村土地保持了联系, 其微观经营基础仍然是家庭经营。绝大部分家庭都同时经营农业和参与非农就业。只是部分村庄由于本地非农就业机会较多, 家庭可以在本地短线打工与外出长线打工之间做出选择, 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半工半耕”形式。

发达的乡村产业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在通勤范围内非农就业。JZ 市是典型的以本地非农就业为主的区域。JZ 市 XD 村是本村工业最为发达的村庄之一, 以 XD 村三组为例, 全组大约 300 劳动力, 其中大概 150 名劳动力在本村种植梨树和打零工。本村工厂吸纳了 80-90 名青壮年劳动力, 月工资在 3000 元左右。县城吸纳了十几个劳动力, 主要是在手套厂工作。还有十余个劳动力在 XJ 市从事皮革加工行业。这些在县城工作的劳动力也没有真正脱离乡村, XJ 市离 XD 村十分近, 可以骑着电动车上下班; 家在 JZ 市的一般住在宿舍中, 休息时间回家。真正离开农村, 比如到 S 市、到外地务工的劳动力十分少, 去 S 市的少于 10 个。JZ 市 XZK 村, 虽然本村工业不多, 但邻近的 XJ 市皮革加工产业吸纳了许多劳动力, 加上商贸服务业发达, 真正离开农村“长线外流”的劳动力也不多。JZ 市 ZSZ 镇的 ZSZ 村也是如此, 该村劳动力有 2600-2700 人, 真正长期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只有五六十人。

乡村产业进一步固化了家庭经营。乡村形成了“家里有人种地, 有人打工”的本地“双顾模式”, 并且这种双顾模式有着明显的年龄和代际分工。以 MFY 村六组

为例，该村民小组有 72 户村民，18 岁以上具有劳动能力者总计 228 人，65 岁以上有 9 人^①。我们让村民小组长列举了该小组村民职业的情况，如表 6 所示。

表 6 MFY 村六组 72 户村民就业情况

	18—30 岁		30—40 岁		40—50 岁		50—65 岁		小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农	0	0%	5	11%	12	23%	28	40%	45	20%
工	37	61%	22	50%	10	19%	6	9%	75	33%
商	0	0%	2	5%	1	2%	0	0%	3	1%
农工	2	3%	9	20%	29	55%	23	33%	63	28%
农商	3	5%	5	11%	0	0%	8	11%	16	7%
工商	0	0%	0	0%	0	0%	0	0%	0	0%
农工商	0	0%	0	0%	1	2%	0	0%	1	0%
学	19	31%	0	0%	0	0%	0	0%	19	8%
无业	0	0%	1	2%	0	0%	5	7%	6	3%
小计	61	100%	44	100%	53	100%	70	100%	228	100%

由上表看出，我们看到村民职业的代际分化，40 岁以下的青年劳动力一般从事工业；40 岁以后开始兼营工业和农业；50 岁以后，从事农业比例开始显著增加。

上表也体现了家庭成员明显地代际分化。“年轻人不愿意种地”，除了经济性因素，更是有着社会性因素。打工和种地比不一定打工赚得多，年轻人不愿意干农活一方面是因为嫌脏嫌累，另一方面是觉得农业没有保障。中年人兼营农业和工业，可谓“半年田半年工”，比如梨树种植到九月初就基本结束，在剩余的农闲季节会打零工，这就是典型的“双顾”模式。“双顾”的另一层含义是，既从事了非农就业又照顾了家庭。在一些乡村产业发达的乡村，许多人都在乡村务工而不愿外出务工，主要是为了可以照顾家里的老人与小孩。按照村民的说法，“如果能在本村挣 3000 元，远一点挣 5000 元都不去”。

（二）乡村社会分化与城镇化

根植于乡村社会的产业体系，极大改变了乡村社会面貌，成为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重要基础（李强等，2015）。但是乡村产业与就近城镇化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在机制。

城镇化已经成为一种重要趋势，进城买房已经成为一股潮流，然而城镇化有着

^① 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左雯敏收集并整理相关资料与数据。

极强的“层级分流”特点，呈现出“分层沉淀”的模式。少数较高收入的群体会举家迁移到东部城市“落地”；中等收入的群体则会在家乡城镇、县城买房；低收入群体则会在家乡村庄翻盖新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7）。

表 7 S 市 JZ 市村民城镇购房情况

	总户数	村里自建或翻盖（近五年）	新民居	乡镇	县城	S 市	其他（请注明）
XD 村	316	基本没有	286	0	十几户	四五户	XJ ^① ，五六户
MFY 村	540	基本没有	1	0	十几户	五六户	XJ，十二三户；JX 矿区，1 户
其中：MFY 村六组	72	基本没有	1	0	5	5	XJ，5 户；JX 矿区，1 户
ZSZ 村	1116	基本没有	20 ^②		25	四五户	XJ，2 户
XZK 村三组	100	基本没有	0	0	2	1	XJ，5 户

S 市乡村地区有着很强的“就地”或者“就近”城镇化的趋势，并且呈现出“梯度城镇化”的特征。所谓“梯度城镇化”是指农民依据自身实力在“村庄—乡镇—县/市—地市—省会”的梯度流动。上表是笔者在 S 市 JZ 市对农户“进城买房”的情况所做的统计，反映了农户在不同本地不同城镇层级购房的情况。

S 市周边地区几乎没有农户自建或者翻建自家住房，有极少数村庄通过“新民居”实现了农民上楼。2008 年，S 市推行了以“占补平衡”的方式获得土地指标的“新民居”建设项目，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一些村庄实施“农民上楼”（周飞舟、王绍琛，2015），于是许多村庄建设了许多楼房。但是由于农户宅基地复垦困难，新民居项目最后被叫停。XD 村在强大的村集体经济的支撑下，建成了配套设施齐全的小区，并以较低价格出售给村民。其他村庄的“新民居”大部分建设进度缓慢。中西部地区乡镇普遍缺乏城镇建设所需的土地指标、建设资金以及城镇管理权限，极大地削弱了乡镇的吸纳和集聚能力。从 S 市的调研来看，乡镇几乎没有商品房建设和出售。县城买房成为重要趋势，有一定比例的农户已经在县城买房。一般而言，能够在县城买房的农户具有较高的经济收入。以 XZK 村三组为例，在县城（包括 XJ 市）买房的 7 户家庭中有 5 户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这类家庭要么外出打工挣钱，要么在乡村做小买卖或开办小工厂，或者从事其他收入较高的行业。极少数在

① JZ 市 ZSZ 镇和 MY 镇靠近 XJ 市，并且这两个乡镇去 XJ 打工的农村人口特别多。

② ZSZ 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新民居也位于集镇。

地级市即 S 市买房。JZ 市农村居民在 S 市买房主要是由于家里孩子大学、大专毕业后在 S 市找到稳定工作而买房。对于这种买房情况，本文讨论从略。

S 市乡村地区的“就地城镇化”呈现如下三个特征：

第一，产业与城镇化的关系。乡村产业的兴起繁荣了乡村经济，为农户进城买房提供了基础，但是在县城购房的群体呈现出明显的“职住分离”的特征。许多在县城购房的家庭并不在县城居住，或者只是在冬天居住。比如 XZK 村三组买房的 7 户农户中，真正在县城居住的家庭只有 2 户。这与前文讨论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有关系，发达的乡村产业吸纳了许多就业人口，但乡村产业主要分布在乡村，即使是乡村工业也分布在村庄中。XL 市 XL 村甚至出现了少数村民在县城买房居住，白天从城市去村里种植大棚的“反职住融合”。

第二，社会性因素买房。教育资源在城乡的分布情况，极大地影响了人口流动、迁移趋势。农村学生向县城集中，导致了县城的学位紧张，许多地方出台了必须买房才能在相应小学上学的政策。由此，“进城上学”成为“进城买房”的重要因素。调研发现，由于下一代的教育需求，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选择到附近的城镇租赁住房或购置房产。另外，农村男青年结婚条件逐步攀高，到县城买房已经成为许多农村地区男性青年结婚的必备条件之一（陈锋，2014）。甚至经济条件越差的村庄或者家庭反而需要具备更高的硬性条件才会在“婚姻市场”上具备竞争力，导致了经济条件一般甚至较差的家庭为了给儿子娶上媳妇而“咬牙买房”，从而让家庭负债累累。以 S 地区调研情况来看，“结婚买房”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家庭并不具备买房的经济实力，通常是举债买房；二是买房的目的不是改善居住条件，而是纯粹为了提高男青年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

第三，居住方式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别。虽然一定比例的农户在县城买房并搬离农村，但是家里老人一般会选择居住在农村。即使 XD 村通过购买新民居实现“就地城镇化”的农户来说，居住方式也呈现出代际差异。村里的年轻人全部都住进了楼房，但是老人依然住在村中，只有冬天才会上楼享受集中供暖。

六、总结与讨论

中国乡村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长期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在此基

础之上形成了明显的自主发展与转型逻辑。乡村产业作为一个经济生态系统，与乡村社会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有学者强调乡村产业对于城乡发展的积极意义，提出了“三元结构”理论（李克强，1991；陈吉元、胡必亮，1994；林刚，2000），以区别既有“二元结构”的社会转型道路（Lewis，1954；张培刚，2014：220）。鹤见和子提出了“内发型发展”（鹤见和子，1989），尤其关心乡村既有社会结构（“型”，包括意识形态、技术和社会关系）对于发展与转型的影响。

乡村产业和乡村社会的“内发型”发展，其基础是家庭经营的强韧性。近代以后，“半工半农”的家庭经营模式一直延续下来。传统时期由于城市吸纳不了过剩劳动力，导致了家庭经营基础上“非农化”、“过密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半城市化”的流动，形成了农村粮食作物种植与外出打工的结合。新时期，乡村产业的新发展导致了“半工半耕”进一步变化，本地农业与本地非农就业的结合形成了本文所谓的“双顾模式”。

乡村产业的繁荣为“就地城镇化”提供了基础，但是产业与城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机制。城镇化的微观基础是家庭的决策过程。家庭决策综合考虑了家庭的收入水平，家庭成员的未来预期，更为重要的是与家庭关键成员的生命阶段紧密相关。家庭作为重要的经营单位有着丰富得多内涵，一是体现为家庭成员农业和非农业的分工。二是体现为代际分工，即家内不同代际的成员处于不同的生产模式中。三是家庭代际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诉求，但一般而言，子代的结婚和孙代的教育，是压倒一切的家庭核心任务，这也是导致家庭在不同时间节点流动、购房的重要因素。四是在买房这个问题上，也呈现出财富的往下传递，上一代供下一代买房。

从生产活动来看，乡村两代人处于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从城镇化过程来看，其典型特征也是代际流动的城镇化，老人住在农村，而年轻人进城住楼房。将来老年人过世以后农村是否会凋敝，尚取决于目前的年轻人将来是否能够在城市立足。

此外，只有深入理解家庭内部关系和家庭伦理，才可以进一步理解就地城镇化的发生机制。“进城买房”主要是“为下一代买房”。在S市的实地调研发现，很多人买房是为了孩子结婚、上学，或者是为了“预备”以后孩子上学或者孩子结婚，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何“职住融合”程度很低，但中西部地区进城买房依然是一股潮流。“咬牙买房”更与中国家庭伦理有着紧密的联系。所谓“咬牙买房”指的是很多家庭实际上不具备买房的条件，但是为了给儿子结婚而倾尽全力甚至背负

一身债务买房，并且因为买房欠下的债务也主要由父亲偿还。只有理解了中国的家庭伦理才能理解这种行为，为儿子娶上媳妇，是中国人尤其是传统农村居民的重要人生任务。实地调研中，一位老支书的话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欠别人的钱能还，但是如果儿子娶不上媳妇，这个债没法还”。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7，《乡村社会变迁和农村社会政策研究》，未刊稿。
- 陈锋，2014，《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陈吉元、胡必亮，1994，《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研究》第4期。
- 陈文超、陈雯、江立华，2014，《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 方显廷，2009，《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佣制》，《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经济卷 [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费孝通，2006，《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7，《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9，《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12，《乡土重建》，长沙：岳麓书社。
- 傅春晖，2014，《包买制：历史沿革及其理论意义》，《社会学研究》第2期。
- 付伟，2016，《许村家纺：工业化的乡土逻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论文。
- 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2002，《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 韩启民，2015，《城镇化背景下的家庭农业与乡土社会——对内蒙古赤峰市农业经营形式的案例研究》，《社会》第5期。
- 贺雪峰，2013，《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几点认识》，《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鹤见和子，1989，《“内发型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胡天民译，《江苏社联通讯》第3期。
- 胡浩、王图展，2003，《农户兼业化进程及其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分析——以江苏省北部农村为例》，《江海学刊》第6期。
- 黄家亮，2017，《华北农民非正规就业的微观形态：基于河北定县两个村庄的考察》，未刊稿。
- 黄宗智，2000，《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 ，2006，《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上、下）》，《读书》第2、3期。
- ，2009，《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开放时代》第2期。
- ，2016，《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开放时代》第2期。
- 李克强，1991，《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李强、陈振华、张莹，2015，《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广东社会科学》第1期。

- 李庆、林光华、何军, 2013, 《农民兼业化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数据的分析》,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林刚, 1995, 《试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对中国、西欧资源配置方式演变过程的回顾》,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
- , 2000, 《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
- 林毅夫、蔡昉、李周, 1999,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 格致出版社。
- 凌鹏, 2007, 《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商品化与地权分散——以河北保定清苑农村为例》,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施坚雅, 1998, 《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 史建云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史建云, 1994, 《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初探》,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
- 王春光, 2006,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王绍琛、周飞舟, 2016, 《打工家庭与城镇化——一项内蒙古赤峰市的实地研究》, 《学术研究》第1期。
- 吴承明, 2001, 《中国的现代化: 市场与社会》, 北京: 三联书店。
- 吴知, 2009, 《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经济卷[中])》,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 夏柱智, 2014, 《论“半工半耕”的社会学意涵》, 《人文杂志》第7期。
- 谢勇、周润希, 2017, 《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第2期。
- 徐宗阳、焦长权, 2016, 《茶与城镇化: 新时期乡村经济生态的案例研究》, 《学海》第4期。
- 许倬云, 2012, 《汉代农业》, 程农、张鸣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杨华, 2015, 《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 《农业经济问题》第9期。
- 张培刚, 2014, 《农业与工业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赵冈, 1977, 《中国棉纺织史》,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周飞舟, 2006, 《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 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周飞舟、王绍琛, 2015, 《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 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祝仲坤, 2017, 《农民工返乡建房行为研究——基于推拉理论的解释框架》, 《经济体制改革》第3期。
- Chang, Gene Hsin & Josef C. Brada 2006, “The Paradox of China’s Growing Under-urbanization.” *Economic Systems* 30 (1).
- Lewis, W. Arthur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 (2).
- Ofer, Gur 1976, “Industrial Structure, Urbanization, and the Growth Strategy of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0 (2).
- Szelényi 1981,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Management in Eastern Europe.” *Theory and Society* 10 (2).
- Zhang, L. & Simon X. B. S. Zhao 2003, “Re-examining China’s Urban Concept and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Habitat International* 27.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朱涛